

第三届中国国际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赛日前在北京举行,300多件作品参与了此次比赛。

图①:参赛作品

图②:获奖作品在国家大剧院展出

图③:意大利评委在评选作品

(本文图片由中国乐器协会提供)



①



③

可能没有一个乐器比小提琴更能引发外媒对中国的关注了。这个拥有西洋血统,代表着西方精致、顶尖传统手工艺的乐器,在过去的三十几年间,被中国制造迅速占领了市场,让西方人大跌眼镜。

2005年,路透社记者以“中国制造的小提琴淹没了竞争对手”为题,报道了中国乐器进入世界的状况,文章说中国变成了神秘的小提琴制造工艺的最大实践者,中国产品正在挤走日本铃木小提琴公司和雅马哈公司的产品。

2007年,《洛杉矶时报》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神奇的小提琴王国》则表示,过去10年里,中国小提琴改变了世界弦乐器的生产格局,虽然中国生产的乐器质量大幅提高,但就顶尖水平来说,中国还没有占领供专业人士和资深业余爱好者使用的高级乐器市场。不过,也许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如今,时间又过去了10年。中国小提琴在占领了世界市场的同时,是否撕掉了廉价、中低端的标签?

三十多年不懈努力 外国专家高度评价 中国也能出好琴

本报记者 郑娜

从艰苦年代走来的老一 辈制琴师

操着广东腔的普通话,拄着一根拐杖,85岁的徐弗先生,在国家大剧院的东展厅里慢慢踱着步,欣赏第三届中国国际提琴比赛的获奖作品。

如果没有人介绍的话,谁也不知道这位老者是一位国家级的提琴制作大师。从15岁起开始做乐器的他,亲身参与并且见证了这中国数十年来小提琴制作的发展。

“我以前是做民族乐器的,后来国外的小提琴订单大增,我就开始做小提琴了,一做就是几十年。”徐弗说。一提到小提琴,这位步履蹒跚的老先生马上焕发出一种青春的活力。

1982年,徐弗曾在美国第五届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中一举夺得工艺和音色双奖,那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双料奖项。回忆起当时参加比赛的窘况,徐弗告诉记者,当年因为没钱参加比赛,就临时又做了一把琴,把琴底做参赛费用。

“以前中国制琴师参加国外比赛太难了。寄一把琴到国外参赛,费用几乎超过了一年的工资收入,还会遇到琴在运输途中被摔坏的问题。甚至参加国际比赛后寄回来的琴,我们没有钱去取,就不要了。”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主任郑荃教授对记者说。

然而,即便在条件那样艰苦的年代,像徐弗、陈锦荣、梁国辉、戴洪祥等老一辈制琴大师,还是在国际比赛中拿了奖,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为此后中国小提琴制造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回头看看,新中国成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没有音乐学院,也没有乐器制造行业。新中国成立后,提琴制作基本上是闭门造车,没有国际交流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后,才有了国际交流。”郑荃说。在他看来,中国的提琴制造业发展到

今天的水平,很不容易,也很值得骄傲。

从低劣、低端向中高端、 顶级转型

从闭门造琴到一举跃为小提琴制造大国,中国只用了三十九年。这样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制造”对于世界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郑荃坦言,在中国小提琴制造的早期,是以工业化生产、质量差在世界闻名的,甚至一度成为低劣品、“蹩脚琴”的代名词。日本的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就曾叹息,中国有第一流的演奏家,却用着最末流的乐器。

但今天,这一切显然已成为过去。据中国乐器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曾泽民介绍,中国小提琴制造现在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提琴制造企业,大概七八百家,去年年产提琴99万把,出口81万把普及型用琴。另一支是手工制琴师队伍,大部分是海外留学回来或由国内培养的提琴制作技术骨干,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形成三个提琴制作集群。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在音乐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设立了提琴制作与研究研究中心,培养研究生学历的制琴师。据中央音乐学院书记郭淑珍介绍,培养这么高学历的制琴师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为少见的。

手工制琴师队伍的壮大,使得中国小提琴制造有了质的飞跃,那就是以制造中低端的普及琴为主,向中高端尤其是顶级琴方面转型。

“如今,我们逐渐可以用自己的乐器武装自己的乐团了。”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说,“我们要向国内提琴制作师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为国家节省了外汇,赢得了声誉。”正如他所说的,近些年来,中国制琴师屡屡在一些国际比赛中摘得大奖,国际影响力逐渐提高,有不少中国制琴师制作的小提琴已进入中高端、顶级琴

行列。

来中国参加过3届提琴制作比赛的意大利提琴制作界元老莫拉西,就竖着大拇指对记者说:“小提琴制作有意大利学派、德国学派、法国学派,中国向各个学派学习,一步步往上,不管是在木材还是在油漆的工艺上,都特别优秀,水平很高。”

距离克雷莫纳还有多远

意大利提琴博物馆馆长威拉说,现在中国的小提琴制作已经很接近300年前意大利的克雷莫纳。这个因小提琴驰名国际的意大利城市,不仅是几个世纪来小提琴的设计研发中心,而且出现了斯特拉迪瓦里和瓜奈里两位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

对于如此高的评价,郑荃理性看待:“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让国际上认识到中国琴的质量大大提高了,中国出好琴。很多国外的专家来中国前,都不相信中国能做出高水平提琴,如今他们对中国提琴

的发展赞叹不已,认为提琴制作的未来在中国。这个观念的转变非常不容易。”

不过,郑荃也清醒地看到不足,那就是中国制琴师对琴文化的了解和美学艺术修养还与欧美存在差距。“在中国,许多人觉得做琴和做木工的工匠没多大区别,说是艺术门类,许多人不以为然的。事实上,小提琴制作是一种艺术门类,和音乐、建筑、雕塑、美术是密不可分的。”郑荃说。

在这一点上,美国提琴制作家协会主席格雷克也毫不讳言。他认为中国制琴者在技术和知识上,水平已经很高,但是在想象力和灵感上还有所欠缺。“不要忘了我们是在做一件乐器。”法国制琴大师帕特里克最想与中国制琴师分享这一点。他说,乐器是非常敏感的,跟人一样,制作者得跟它有对话,要赋予它灵魂。

想象力、灵感、灵魂,也许就是中国距离克雷莫纳的距离。在旅美华人制琴师江峰看来,它们并不像听上去那么深不可测,实际上就是长年累月的文化积淀和艺术修行。



5月12日,在第三届中国国际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赛颁奖音乐会上,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用获奖作品演奏。

伯恩哈德作品再次来华引热议

文艺如何面对人类“文化危机”?

白瀛

1938年3月15日,维也纳的英雄广场上,希特勒宣布德奥合并,奥地利民众欢呼“必胜”“致敬”;50年后3月的一天,犹太籍教授约瑟夫·舒斯特在英雄广场旁的公寓内跳楼自杀。

这是托马斯·伯恩哈德剧作《英雄广场》的故事背景。波兰导演陆帕,继去年5月的《伐木》之后,再次将这位作家的作品带到中国。时隔一年,京津戏剧界、知识界也再次将目光投向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但此次的焦点,从导演转向了作家伯恩哈德。

《英雄广场》的剧情就发生在约瑟夫教授下葬的当天,三幕中,他的仆人、家人、同事在聊天中回溯了其一生:二战期间流亡国外,战后返回维也纳,却因无法忍受身边潜在的反犹主义而自杀。结尾,约瑟夫的妻子也因再次听到民众在广场上对希特勒欢呼的幻觉,

昏倒身亡。

该剧作者伯恩哈德(1931—1989)是20世纪重要的德语作家,共创作了18部戏剧,曾获毕希纳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奖等数十种文学奖项。他的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和尖锐的批判著称。《英雄广场》是其最后一部剧作,1988年11月在维也纳城堡剧院首演前后,也曾引起激烈讨论。

学者周国平说,伯恩哈德在《英雄广场》中愤世嫉俗地攻击了纳粹政治和奥地利人的愚蠢、平庸。“他很极端,一再说维也纳全都是纳粹分子;我想作者并不会真的认为全都是纳粹分子。但他实际上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普遍的愚蠢、平庸就是纳粹的土壤,在他们这些人里,纳粹很容易复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认为,剧中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不是社会政治,而是第三

场揭示出的深重的、不可解的“文化危机”;其中的悖论在于,人们道德上寻求和支持的东西恰恰是造成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

翻译家、戏剧编导李健鸣说,伯恩哈德1988年写的这部戏有一定的预言性和警示性。“20多年过去了,就像剧中约瑟夫的弟弟罗伯特教授所说,精英文化已经被平庸的大众文化所淹没。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要跟伯恩哈德以及陆帕学习的,对人性关怀、对世界文化的关怀。”

“人类的智慧各不相同,但愚蠢却是一样的。”鲁迅题材话剧《大先生》的编剧李静说,《英雄广场》中诅咒和抨击的愚蠢、怯懦、疾病,全世界都可以找到;如果把剧中的犹太人换成自己身边某些被驱逐的弱势群体,各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自问,戏剧和文艺做了什么?

国家文物局于日前召开例行发布会,会上,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朱晓东表示,经过广泛征集和评选,2016年文化遗产日主题最终定为“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自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日,相关活动一直备受关注。朱晓东说,今年文化遗产日提出5条口号,分别是“保护文化遗产,创造美好生活”“为文保员点赞,向守护者致敬”“文化遗产无价宝,需要你我呵护好”“保护传统村落,留住最美乡愁”以及“避暑山庄:和合承德”。

“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化古迹到乡村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城乡记忆的有力物证,是城乡价值的重要体现。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是避免城乡记忆消失的有力保障。”朱晓东同时表示,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场城市为河北承德。

承德市政府副秘书长孙雷介绍,6月11日遗产日当天的活动,将围绕在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举行。上午的活动主要有5项:一是在普宁寺广场举行开幕式;二是在普宁寺广场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展和向守护者致敬展览;三是为2014年度“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单位”授牌;为全国长城保护员代表颁发装备;向避暑山庄武警消防官兵、普宁寺喇嘛教务委员会义务消防队授旗;四是在承德市博物馆选址举行承德民族团结清文化展览暨承德市博物馆建设工程奠基仪式;五是举行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普陀宗乘之庙)竣工仪式。下午的活动主要有2项:一是举行古建筑保护成果摄影展和中国文化遗产美术展(左江花山岩画);二是实地观摩避暑山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闻物宣)

中国话剧《乌合之众》 秘鲁首演受赞誉

由中国和秘鲁戏剧艺术家合力打造的西班牙语版中国话剧《乌合之众》,近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中秘友谊馆举行首演,极具冲击力的剧情和情真意切的表演,赢得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乌合之众》讲述了一个热血青年为母亲复仇的故事。它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人、艺术室主任喻荣军担任编剧,秘鲁女导演玛丽萨·贝哈尔执导,孔子学院拉美中心翻译。

当晚8时,可容纳200人的中秘友谊馆座无虚席。台上,秘鲁戏剧艺术家倾情演绎太平洋彼岸的故事;台下,观众无任何语言隔阂,全身心地投入精彩剧情之中。演出结束后,在观众热情洋溢的掌声中,前来利马参加话剧艺术交流活动的喻荣军、导演玛丽萨走上舞台与演员牵手致谢。

喻荣军说,这部话剧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戏曲的形式,同一个演员会在台上演几十个人物,用不同角度看同一事件,排练难度大。尽管如此,他认为秘鲁演员当晚的表演非常出色,“把我剧本所表达的东西传递给了观众,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表演”。

秘鲁天主教大学学生阿拉娜·马德里说,这是她第一次看中国话剧,她认为剧情精彩,表演出色。

据秘鲁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朱玉山介绍,将中国作家的佳作推上秘鲁话剧舞台,是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举办的“中国作家拉美行”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为了让秘鲁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孔子学院拉美中心将《乌合之众》翻译成西班牙语,这也是中国话剧首次被翻译成西班牙语。

中国驻秘鲁大使馆文化参赞朱晓燕说,中国话剧登陆秘鲁,有助于当地民众增进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以及中国当代话剧艺术的了解,将促进两国在戏剧表演艺术领域的交流。

据主办方介绍,《乌合之众》还将在秘鲁演出多场。(张国英)

“中国三大男高音” 将网络收徒

由戴玉强、莫华伦、魏松三位著名歌唱家组成的“中国三大男高音”近日在京宣布,将成立“三高文化专项基金”,传播中国文化,促进高雅艺术的推广普及。与此同时,三大男高音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网络招募亲传弟子,以公开课的形式传授声乐技巧、艺术鉴赏、舞台表演、塑造人物等内容。被选中的弟子将在三位歌唱家领衔的专业教师团队指导下,进行系统化的学习。整个教学过程将实时上传网络,其他声乐爱好者可以全程观摩学习和跟进互动,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三大男高音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借助网络的力量,以点带面,培养几个人,辐射数万人。这是我国网络声乐慕课的一次尝试,为声乐教学模式开辟了一条新路。(郑娜)

华中首家艺术村落落户黄冈

日前,湖北鼎韵山水艺术村项目在黄冈市团风县杜皮乡开工,标志着华中地区首家艺术村正式落户黄冈。鼎韵山水艺术村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由鼎韵画家村、“筑·居·思”建筑作品展、“游园惊梦”主题景观园林等组成。

同时,杜皮乡政府与鼎韵山水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共建山水文化助力老区扶贫”的协议。鼎韵将通过山水艺术村项目的建设及后期推广运营,积极开发相关产品,包括当地特色农业及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古村落保护等,为民营企业资本、技术、市场、人才等优势与当地生态、土地、劳动力、特色资源等结合起来,帮助当地居民脱贫致富。(安冬)